

●文化漫笔

20世纪中国哲学家的思路历程

——漫谈《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

叶秀山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送来汤一介先生主编14卷《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皇皇数百万字。书寄到刚一拆封，同事们一涌而上，纷纷挑选自己有兴趣的题目，夹带而去，我只得限期请他们归还，可见这套丛书，非常切合当今学界的需要。

每卷开篇，有一介先生的总序，我认真学习，的确获益匪浅。

我专做西方哲学的研究，近年也留心学习中国传统哲学，因而对于中西哲学之交流融通问题，也有所注意，但是对于历史情况，不甚了了，读汤先生序，使我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对于其中的理论问题，也更加明白起来。

我尝想，一个民族的文化如要形成气候，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光彩，要看这个文化的内涵有多丰富，含金量有多大，而这种含量，一方面要有自己的根基，另一方面要靠吸收外面的营养，加以消化，融会到自己的文化机体中去。世界上很难找出纯粹单一的文化，就像找不出完全单一的人一样。文化内涵丰富，不等于庞杂，而同样也可以是很“纯粹”的。世上或有那与世隔绝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化一定是很单纯、很纯粹的，这种文化，自有其历史考古的价值，但要求她要有很广阔的内容，也就难了；所以或许我们可以说，一种文化单方面要求“纯粹单一”或者单方面要求“杂多”，或许并非特别困难，但如求其“纯粹”而又“丰富”，“博大”而又“精深”，则是很为难得的，这也许就是哲学上说的“一”与“多”的

统一,康德说的,“先天”而又“综合”的“知识(判断)”吧。

西方哲学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古代希腊哲学,谁也不能否认它的独特性,但它也是多种文明的融通的产物;康德/黑格尔有独特的哲学体系,但他们在独特的理论基础上融会了整个的欧洲哲学的历史。

哲学是很“纯粹”的学问,但又是内容最为丰富的学问,涵盖而也是最广的;“纯粹”并不等于“抽象”,“哲学”不仅仅是“(形式)逻辑”。

哲学也很“超越”,但哲学的超越—超验绝不排斥经验,恰恰相反,哲学的超越性正是就在经验之中,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通过现象看本质”,现象和本质原本同一,单纯的“本质”,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按康德的意思,它们是“不可知”的,也就是说,原本不是科学知识的对象。哲学所思考的本质,必从现象(就康德说,为“表象”)中显现出来——这就是“现象学”。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需要经验,需要经验作为它自身的“环节”,哲学学习人类全部的历史,哲学也随着历史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哲学既不排除经验,则本身也有“进步”,当然哲学的进步有自身的特点,但它仍然如同其他科学一样,随着时代历史推移,总体向着纵深方面发展。

哲学的发展,又由于哲学本来就是一门“开放”的学问而具有自身特殊的吸收性,哲学是容量最大的学问。哲学与故步自封为敌。中外哲学的交融如此,西方哲学本身的发展也是如此。

西方的哲学源于欧洲古代希腊。小国寡民的希腊之所以成为哲学的摇篮,其原因学者众说纷纭,我想有两个条件值得重视,一是雅典的民主制,二是海上通商之便利,而这两条都与“经验”之丰富性有关。通商提供物质文明,民主更具精神文明,当然二者又是互动的,通商带来的文化知识和民主带来的生产建设,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当其时埃及、波斯等地对希腊文化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

中世纪宗教的禁锢,哲学发展缓慢,但在这缓慢过程中,希腊

哲学精神和基督教神学的斗争磨合,推动西方哲学为消解此种神学而作出了巨大努力,从而使欧洲哲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哲学从培根—笛卡儿有了一个突破,再经康德—黑格尔终成大器。

黑格尔哲学号称“绝对”,可谓“超越—纯粹”已极,但它却“包容”了整个的“(经验)世界”。正是这个黑格尔,以经验的环节为哲学的范畴,哲学的概念体系也就是经验的发展过程,“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于是他的所谓“绝对”,才是真实—真正的“绝对”,而不是与“相对”“对立”的“抽象绝对”,才真的是“绝对—无对”。

这样,在黑格尔的绝对体系中,“宗教—基督教”成了他的哲学体系的一个“环节”,他的哲学“包容”了“宗教”,也就在思想理路上“消解—化解”了“宗教”。

西方哲学“消解”“宗教”时日已久,成大气候的自康德始,至黑格尔可谓大成。通过他们的工作,“自由”观念在哲学中得到深化:由古代希腊的“自由知识”,进入“自由意志”,从而理性不仅具有“建构”的能动性,而且具有“创造”的力量,这样哲学就有可能化解—消解基督教的“创世说”。“自由理性”不仅自己“建立”自己的知识“对象”,“理性”作为“自由意志”更有“创造”“价值世界—道德世界”的能力,于是,从康德的“至善”观念的无限绵延,到黑格尔“绝对”理念的外化,再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都可以看出,哲学在迎接各种“挑战”斗争中的发展轨迹。

其实,就从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说,欧洲也并非“一体”,大致分来,尚有“欧洲大陆理性”和“英国经验主义”两大类型,前者已如上述,后者更致力于与经验科学和逻辑沟通;上个世纪出现力图融通这两种倾向的努力,其效果虽尚需等待时日,但融通的成绩还是应该肯定的,融通的工作,对双方都有促进。

正如这套丛书所表明的,我们中国的哲学工作者长期以来,对于西方这两大类型的哲学潮流,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在引进、介绍和研究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这不能不对我国传统的哲学构成极大的挑战,也提供了更新发展、提高深化的机遇。事实上我们也取

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一点,从汤先生主编的这套丛书是可以清楚地看到的。

我们中国的人民,中国的学问,是世界上最能吸收外来文化思想的,中华民族是最具兼容并蓄品质的民族。在现代意义上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很久以前,我们已经积累了融通外来文化的丰富经验,中国传统的音乐、戏剧、诗歌、舞蹈等等,全不是单一的系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早已经是“多元”的,而这其中的核心,也还是哲学性的,尽管哲学方式的变化,是更加深入,因而相对比较缓慢的。

这方面,人们常常引用的例子是佛教的传入中国。佛教在经过一段磨难之后,终于在中国生了根,三教合流,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中国人替印度人保存、整理了佛教的许多原始资料——就像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以及阿拉伯人替希腊人保存、整理了古代希腊哲学的许多资料一样,而且也像这些国家的人民对待希腊哲学一样,将原本外来的佛家思想融入传统,将“异己”化为“自己”。欧洲哲学自然以古代希腊哲学为自己的传统,谈中国传统哲学,也离不开佛家的传统。

以我粗浅的看法,我觉得,就西方哲学与西方宗教——基督教的关系来看,它与中国儒道和佛教也有类似的情形。西方哲学传统接受基督教的挑战,终于出了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大哲学家;中国的哲学传统,接受佛教的挑战,也出现了宋明理学。

西方的学者把宋明理学叫做“新儒家”,现在的“新儒家”却另有含义。现在的新儒家早年注入的正是上述从康德到黑格尔这样一条思路。牟宗三先生得力于对于康德哲学的研究体会,熊十力先生强调“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我们的贺麟先生早年也努力将黑格尔哲学与宋明理学结合起来。当然他们的学养都很深厚,只是从思想线索上大体而言,都受德国古典唯心论的影响,将中国儒佛道传统与这个哲学思路融会贯通起来,努力使这个传统开显出新的境界。

黑格尔以后,西方哲学出现纷繁的局面,叔本华、尼采在中国有相当的影响。王国维试图将叔本华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

来思考,可惜工作未能完成;以后西方出现的各种哲学流派思潮,在中国的反映一度比较微弱,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大批量引进,应接不暇,经过九十年代,积累、整理了不少材料,加之国际学术交流途径畅通,学者间相互了解沟通已无大的障碍,使得中国学者有可能逐渐将积淀铲除,对于西方哲学上个世纪的发展面貌在观念上比较地清晰起来,英美的系统,大陆的系统,理解上都多少有了些条理。

我本人当然还是很闭塞的,就我的感觉,中国哲学要发展传统,如果进一步注意研究从胡塞尔现象学以来至法国上个世纪的哲学思潮,着意加以吸收融通,当不失为—件重要的工作。

如果如上所说,以前欧陆哲学是应接基督教挑战的成果,上个世纪哲学似乎以应接犹太教思路的挑战为特点。法国晚近一些激进哲学家正在做这方面的消解工作,他们的成绩,已受到中国哲学界的重视,不过我们的了解,也还仅仅是开始。同时,我们看到,西方学者对于西方传统的消解,往往能够在“思之路”上“遇到”东方—中国的传统。德里达消解西方语音中心—罗格斯中心的思路,就是一个例子,更早些时候,海德格尔亦复如是,尽管我们不可以把这个问题简单化。

我比较重视上个世纪法国的列维纳斯,我觉得他的思路对于我们理解我们自己的哲学传统很有参考价值。

西方哲学在康德那里已经肯定了的“实践理性”之优先性,至黑格尔又回到希腊的传统,当然是在更高层面上的回归,其间虽经尼采的呼吁,后来伽德谟解释学也有所推进,但“实践理性”之地位,仍然被悬搁。上个世纪法国列维纳斯断然将“伦理学”置于“形而上学”的位置,并将自己的学说直接柏拉图和康德,这个理论,不能不再一次震撼中国哲学中儒家以伦理为核心的思路。如果说,在康德那里,“实践理性”因缺乏直接感性对象而不在知识领域,从而使它的“形而上学”的地位尚属“可疑”。那么在列维纳斯那里,这种地位,至少在他的哲学系统中,似乎就显得“坚如磐石”了。而我们知道,列维纳斯这种思路,也得力于他的深刻的犹

太文化渊源。他有不少专门研究犹太教的著作,等待我们中国学者去研读。

按我粗浅的想法,如果说古代希腊人把“知识”提(超越)到“形而上”的层面,思考的重点在“存在论—存有论”,那么犹太—基督开启的思路,则是将“意志—道德”提(超越)到“形而上”的层面,思考的重点则在“早于—高于”“存在论—本体论”的“伦理学—道德学”,前者需要我们学习,后者则需要我们自省。

事实上,这套丛书已经在哲学的层面很好地向人们显示,中国学者百年来的工作,是大有好处的,即使其中有持排外态度的,仍然成了人们进一步深入思考问题的契机。我感到,如今我们对于自己的传统哲学,要比以前的确有所长进,在理论思考的深入程度上,也是推进了不少,除了时代的大环境的进步外,对于学者们认真借鉴西方哲学的思考经验,当有一定的关系,就如同对于佛教的思考,促成了新儒(宋儒)哲学的形成一样。

于是,我也觉得,如果我国学者,能够认真消化—消解犹太—基督的思路,从哲学上弄通它们的理路,当对于推进我国哲学的思想,深入理解我们的传统哲学问题,当有所补益。这套丛书中已有一卷提供了研究线索,对于进一步的深入,大有裨益。

我们的先人经过艰苦卓绝的工作,走过曲折的道路,已经融会了佛教这个外来思想,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有机部分,我相信,我们中华民族也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工作,把西方哲学的理路吃透,把它们的学术精华和高尚精神吸收进来,丰富我们自己,使我们自己的哲学以有根基而又有创新这样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哲学之林。

2004年7月22日根据书面发言稿增补